

嚴復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

所遭遇到的難題

尉天驄

政治大學中文系

前言

嚴復生於公元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逝世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綜其一生的背景，在西方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科技主義、工業主義成熟、擴張而又呈現危機的時代；也就在這樣的潮流沖擊下而出現了中國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同光中興那一連環作用的現實。嚴復就是在一歷史發展和歷史現實中所產生的中國知識分子。他是同光時代知識分子的一個類型，有時甚至可以稱之為一種「典型」。爲了了解他，這裡先列下一份簡單的年表：

- 1751年 第特羅編《百科全書》。
- 1762年 盧梭《民約論》出版。
- 1765年 瓦特發明蒸汽機。
- 1776年 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
- 1781年 康德開始出版三批判書。
- 1789年 法國大革命。
- 1840年 鴉片戰爭。
- 1848年 《共產黨宣言》。
- 1850年 洪秀全起事。

- ▲1853年 嚴復生。
- 1857年 英法聯軍入廣州。
- 1859年 胡塞爾(E.G.A Husserl)生。達爾文《物種原始》出版。
- 1860年 英法聯軍陷北京。
- 1864年 太平天國亡。
- 1867年 《資本論》出版。
- 1871年 巴黎公社。
- ▲1876年 嚴復留學英國。
- ▲1879年 嚴復回國。
- 1883年 中法戰爭。英國費邊社成立。
- 1894年 中日甲午戰爭。興中會成立。
- 1895年 馬關條約。割台灣與日本。
- 1897年 瓜分中國運動醞釀中。
- 1898年 戊戌政變。
- 1899年 義和團運動。
- 1900年 八國聯軍入北京。
- 1902年 霍布遜《帝國主義論》出版。
- 1903年 日俄開戰於中國。
- ▲1912年 嚴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
- 1916年 達達運動。
- 1917年 俄國共產革命。
- 1918年 史賓格勒《西方之沒落》出版。
- ▲1921年 嚴復逝世。
- 1922年 艾略特《荒原》、里爾克《杜依諾哀歌》出版。
- 1935年 胡塞爾演講《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現象學》。
- 1936年 西班牙內戰。法西斯運動擴大。蘇聯大審開始。
- 1937年 七七事變、中國大陸抗戰開始。

綜觀嚴復一生，一共活了六十九歲，這六十九年的歲月，大致是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及二十世紀的開端度過的。說起十九世紀後半葉和二十世紀

的開端，史學家們固視之為人類歷史的一大轉變時期；治哲學史或藝術史者，亦認為這是一個大虛無、大反叛、大反省的時代。而這一時代的開始，應該追溯到十七世紀，因為很多史學家已認定那才是世界近代史的開端。為什麼呢？因為近代史的特質是人類社會有一普遍的發展趨勢，那就是（不管其速度是快是慢，也不管其立場是主動還是被動）由地區性走向世界性，由封閉狀態走向開放狀態。而十七世紀的主調亦是如此；它是西方殖民主義日漸興盛的時代，並由是而帶動了世界的發展與改變。其主軸便是工業革命。

殖民主義是一種有計劃的，由內陸經濟擴展到海洋經濟的進程。這進程不僅是經濟的，更帶動了整個世界的改變，甚至使人的生活方式、生命意義都徹頭徹尾換了樣子，而且直到目前為止，還不知要發展成怎樣的結果，這就是甚麼新人類、新新人類、新新新人類……，所以連續不斷出現的歷史軌跡。為了對這一情況有以了解，這裡特多費一些篇幅，引出當代神學家莫爾特曼(G. Moltmann)的話，作為參考。他說：

資產階級世界的確立是與工業世界的確立同時進行的。新機器使第一次「工業革命」成為可能。這一革命在歐洲發了巨大的變革，成千上萬的人由農村流入城市，使工業衛星城鎮得以形成——首先在英格蘭，然後在歐洲大陸。在歷史上，人們第一次能夠平起平坐了——作為勞動力，也作為消費者。構成人類特徵的民族、宗教、文化、性別、種族等在這種新的平等主義面前不得不隱退至台後。朝著資產階級的和工業的世界的運動打破了舊有的階級秩序和舊歐洲歷史局限。

二十世紀的任務產生於十九世紀的遺產。我們可以用一系列的矛盾來界定這些遺產。如果人類要生存下去，這些矛盾一定得解決。

(一) 經濟之擺脫宗教、道德和政治，導致了自由主義的產生，進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家和工人的衝突在十九世紀導致了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又導致了各方面日

益增長的失業科學技術的進步使資本家受益。跨國公司日益擴張的權力使它們得以擺脫國家的控制，並阻止工會對它們的決策的參與。人類若不能對這種情形進行控制，廣大群眾的生活就不會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二) 科技文明極大地豐富了人類的的生活，但同時也使世界人口劇增。一九二六年至二〇二〇年期間，人類數量將增加三倍，即從二十億人增至八十億人。人口過剩已成為我們無法迴避的命運。人口過剩也把自然和人類捲入一場生態災難之中。迄今為止，還看不見擺脫這種災難的出路，但我們若不克服生態危機，我們就生存不下去。

(三) 在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世界裡發展起來的民主政治形式，在二十世紀顯然已不能進一步傳播，甚至在歐洲國家裡也變得不穩固、無保障了。一方面，假如要實現人權，則非有民主政體不可；另一方面，在基本的政治問題上要取得公民意見的一致已越來越困難，因此，從前的民主生活形式正在受到現代官僚機構和權力主義控制的壓制。在西方世界和東方世界，到處出現了軍事獨裁政權。即使在悠久的民主政 裡，要避免獨裁主義政府模式的產生也是困難的，……。

(引自所著《二十世紀神學的歷程》)

除了這些以外，他還特別提到西方世界在近代人類理性的覺醒，到各式各樣打著自己肯定的「理性主義」的旗幟卻從事毀滅人類的事實。這些可以說，都是十七世紀以降，特別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連連出現的真實情況，而且目前仍在發展擴大中。這也就是西方近代文明所製造出來的。

今天，不管我們對這種殖民主義發展出來的西方近代文明抱持怎樣的態度，有幾點認識是應該予以肯定的，那就是：一、沒有殖民主義的擴張，就沒有西方世界今天的強盛。而正因為抵擋不住西方的殖民主義，這才導致了東方社會衰敗的命運。二、西方的殖民主義，只是它的表面現象，在這現象後面還有與之互為表裡的實質存在，這就涉及到它的歷史、它的

哲學、文學、藝術和宗教等等層面。這是文化問題。三、所以中西的衝突，強弱不是僅僅可以用軍事、政治可以解決的，它必須經由文化的層面作一深度的思考和反省。而且這也不是那一個別族群、個別國家，或敵我相對的問題，它已演變成爲人類的共同問題，必須超越個人利益、黨派利益、族群利益而作整體的思考。然而，直到目前爲止，一談到文化問題往往就只涉及到國際問題的層面、黨派利益的層面，而把它膚淺成爲意識形態的辯論。這樣，不但不能改變中國的現實，還必然加深對中國原有基礎的破壞。一至於到了今天，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依然生活在一個悲痛的境遇中。今天我們紀念嚴復先生，正好可以藉此對近百年來的中國作一回顧和思考，然後由此再探索中國的出路。下面便是近些年來的一些讀書心得，現在把它們重新整理、增訂出來，以作拋磚引玉之盼望。在作這種期盼之時，我仍然感到嚴復先生當年的沈痛心情。在嚴復先生的公子嚴璩所撰寫的《先府君年譜》中，曾有這麼一段記載：公元一九〇五年乙巳，也就是嚴復五十三歲那年，他因公赴英國倫敦辦事，孫中山先生特往求見，「談次，府君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爲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中山先生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爲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這種談話雖短，但卻陳述出中國近代社會處於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兩難之局的無奈與悲痛。而證之於近百年來的中國現實，其情況卻也正是如此。

希望這篇報告，能引發朋友們的共同思考和批評。

克隆納在《論康德與黑格爾》一書中，曾在一開始時就述說了歐洲在一七八一至一八二一的精神運動，他說：「在這短短四十年的光景裡，一個人類歷史中前所未有的精神運動展開了。……尤其一八〇〇年前後，一個復一個龐大的系統，以令人目眩心懾的速度被鋪陳出來，一件又一件的創作的面世，似乎將要結集起來締造出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時刻。這一發展雖然迅速異常，但是其中潛伏的一股巨大的力量，而這些思想家正是藉著這一股力量去處理和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日子近了，我們受到了召喚，要把這日子引導出來！嚴復先生是近代中國的啓蒙者，經過了近百年的痛苦，我們也希望能再喚起一個中國現代化精神運動的到來！（爲了有助於朋友們的了解，將附錄一封給前輩的信，以作參考。）

這裡先從中國的歷史發展談起，並由此瞭解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難局。

一、中國古代社會的原型與轉變

在歷史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原是社會的中流砥柱，但發展下來卻一步步被社會上的政治力量腐蝕得沒有力量。而政治中最大的一股腐蝕力量又是游民階級，這就更加了它的虛無感。

要了解，游民階級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傷害，先要了解游民階級。但是，「游民」能不能算是一個階級，這要從中國的傳統社會來考察。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這社會以宗法血統倫理為其運作樞紐，人口不多，土地分配足以維生，如果沒有天災人禍，實在可以維持一個小康局面。所以從很長久的日子以來，中國人所夢想的世界便是以這樣的背景存在於各人的觀念之中，孔孟所嚮往的井田制度，老子所緬懷的小國寡民社會，甚至後來陶淵明等人所夢想的烏托邦，也無不是在這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為了幫助我們了解這一背景，這裡特別引述一下漢代何休對他所作的描寫（見他的《公羊解詁》）。其景象是這樣的：

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角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

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鵝，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尚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為一巷……選其耆老有

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康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晚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宅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

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這一段文字當然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但即使把其中的理想主義成份去掉，仍大致可以見出小農經濟社會的型態。這大概是先秦時代，特別是兩周時代的社會狀況。這個社會為什麼會被後來人嚮往呢？因為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單位，而且是一個文化單位；就某方面而言，它還是一個生態單位。在這單位中，人與人、人與物、人與大自然都有著血肉相聯的倫理關係。那時雖也有領主或商業介入它們的經濟和社會活動中，都只是一種消極性的影響，不會對整個經濟的發展產生破壞作用。這情況到了戰國時代便有了變化，那就是原有的以物易物的販賣經濟變成商業資本，使得土地制度在買賣下成為商品，如此便開始了中國農民生活的嚴重問題。原來：

在一個以自然經濟支配地位的社會中，由於商業有了「獨立的、優先的發展」，從而積累了大量的貨幣形態的商業資本，同時社會上又沒有發達的產業來吸收它，使之轉化為產業資本，這種游資將像洪水氾濫一樣，可以沖垮一切社會堤防。土地制度的變革，就是這種沖擊的直接結果，也就是商業資本和貨幣經濟所產生的消極破壞作用的具體表現之一。因為當土地成了商品而可以自由買賣時，當然誰有錢誰就可以盡量購買。所以土地制度一經改變，立刻就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土地佔有兩極化的現象。從此，土地兼併問題便隨著土地私有制度長期並存下來，於是，以這種土地制度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地主

制經濟，便像一條毒蛇一樣，緊緊纏縛在中國廣大的農民身上……。（引自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

這是初期資本主義在一個以農業（而且是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國所作的影響，也是它對中國社會由古代走向中古所作的革命性的變革。這種變革終極發展，雖然會對中國原有之土地制度產生破壞，甚至會導致農村土地制度的兩極化，使很多人無以為生，但在變革之初，卻可沖破封建制度，而產生很多自耕農，加上漢代以來的抑商政策，便使得中國社會成爲一種「不受封建宗法束縛的封建社會」，這樣就使漢代以來，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成爲一個以平民為基礎的帝國，而「支持中國傳統社會的主要力量，是中國『耕讀傳家』的知識分子……」，而不僅僅再是王室與貴族。（引自胡秋原先生《中西歷史之理解》）這一本質的建立，也是在漢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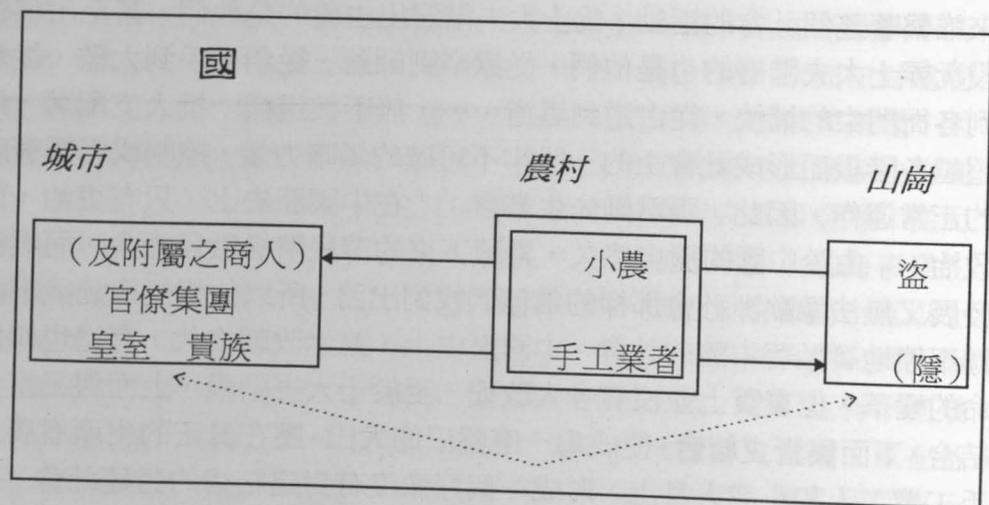
二、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

但是，由於從先秦時代到戰國時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走的是歐洲不同的一條路，所以它表現出的社會形態也就是另外一種形態。歐洲在封建制度解體以後，由於它繼承了希臘、羅馬自古以來商業傳統和城邦基礎，因此在各都市便興起程度不同的市民社會。由於這些商業城市成爲各地的經濟重心，所以，以這些城市為樞紐便帶動了資本主義的成長與發達，從而也爲很多沒有出路的人口尋求了解決之道。到了後來，再加上航海事業的發達更爲歐洲開闢了發展的出口。但中國則不然，由於它的經濟一直以小農經濟為基礎，所以一碰到人口膨脹或土地兼併太快，或者天災人禍相繼發生，便會產生眾多無業游民，這些游民既然失去土地，便只能有下列幾種出路：爲匪盜、當軍人，再不然就游蕩在各個城鎮當人僱傭，或在各個城鎮充當機構之門役或公差，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胥吏。假如我們以一座金字塔的結構來形容中國傳統社會的組成狀況，其情形大致是這樣的：



在中國歷代王朝歷史中，農民、手工業工人以及小商人，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當然也是每一時代真正的生產基礎，然而，他們卻經常處於現實的悲苦中。在歷史的變動（即一般所說的改朝換代）中，農人、手工業工人、小商人往往得不到多大利益，而王室、貴族則是變動中的主要成員，再其次便是士大夫階級。而其中似乎不大受到變動的則爲胥吏那一階層，他們有的師徒相承、有的宗族繼承，自成一個階層，即使改朝換代，也不過換換服色，而無礙於他們在社會上的權力，換句話說，正是這麼一批人來維繫著整個社會的活動，爲士大夫階層出主義的是他們，甚至用種種手段玩弄士大夫階層的也是他們，從獄卒到師爺，從劊子手到太監，從幫會到各衙門中的捕快，從白道到黑道……，無不被這樣一批人支配著，他們超越各階級而形成社會上的一股牢不可破的黑暗力量，控制或影響著社會的正常運作。因此，張君勱先生嘗言：「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吏治，而無政治。」由於中國的歷史悠久，累積下來的游民階級數目龐大，而經濟的發展又無法像歐洲社會那樣的爲他們找到出路，所以他們便像癌症細胞一樣不停地腐蝕著中國的社會。中國歷史上，雖然改朝換代，有過也叫做革命的變革，但實質上並沒有多大改變。至於士大夫階級，上面與王室貴族結合，下面與胥吏結合，便成爲一座堅固的大山，壓在真正的生產者農人、手工業工人和小商人身上，形成一個好像沒有封建結構的封建社會。甚至到了現代，士大夫階級一變而成爲官僚財團，胥吏一變而成爲民意代表，社會基層幹部，便在換形式而不換實質下，仍然是另一種封建社會。這種社會的特質所顯示的中央是一種專制主義；而其顯示於民間者則又充滿了

無政府狀態。俗語說：天高皇帝遠；就是這一社會的寫照。這就形成了中國社會的二元化。一面是以小農經濟的主導的農村社會，一面是作為政治統治中心的城市社會。但是，「中國的城市和歐洲型的城市完全不同，從古到今，它不但沒有脫離封建制度的控制，在封建統治體系之外成爲一個獨立的、自治的和自由的城市，正相反，中國的城市始終是封建統治體系中的一個基本環節，而且是實施封建統治的一個發號施令的神經中樞，各級大小不同的城市——從中央王都到州府縣治，就是等級不同的封建統治者——各級封建政府的駐在地。」（引自傅筑夫前書）。於是，都市的主要活動者是王室貴族、官僚集團、胥吏及與之相配合、相依賴的商人集團。這樣的商人集團一方面要提供消費品，逢迎官場，另外也提供資金作為官員們活動資金。於是不但對中國官場造成極大的腐蝕作用，就是對於一般小市民，在它的影響下也產生極壞的影響。在這樣無法培育出正常的資產階級的情況下，中國傳統的都市，便變成一個道道地地的專制權力的中心。而與之相對的便是一些都市保持「敬鬼神而遠之」的眾多分散在各地的農村。試用圖表示如下：



三、近代中國社會中城與鄉之關係

由於城市中居住的是一些這樣的人，所以，在中國的觀念裡，便有著這樣的印象：

- (一) 城市是壓迫、剝削、享樂、腐化、虛浮的象徵。
- (二) 城市中的官僚貴族與山崗上搶劫爲生的人，在本質是一樣的，所謂「大盜竊國，小盜竊家」、「成者爲王，敗者爲寇」是也。
- (三) 城市中的人使用的是嚴刑峻法，鄉下用的是良心道德，山崗上用的是強盜霸道。這就是法家和儒家之分。如果山崗上沒有強盜，則寺廟叢林之間便成爲隱士寄託之所。
- (四) 於是，鄉村中書讀得多的人便有下列的選擇：爲官（作民喉舌），耕讀爲樂（教化鄉民），隱居山林，逃避官場。這樣儒道便成爲一體。
- (五) 等到讀書人與政治結合，長期居住成市，失掉了農村之根，徹徹底底變成了城市中人，或託身官府，或降身爲吏，或改行經商，便成爲士大夫團體中之一員或附庸，如此，他便只好一變而爲依賴階級、寄食他人之人了。如是而說之儒家便不再是儒家，而是法家的幫凶了。

這樣情況到了近代，便更加嚴重起來了，爲什麼呢？因爲：

(一) 整個北方（自淮河、秦嶺以北算起），由於幾千年高度開發，長年使用的結果，土地的效用已大爲降低，再加上水利系統的徹底破壞，這地區雖然曾經是或現在是京師所在地，但京師之外愈往外走，愈是廣大貧窮的農村。這樣，它就產生爲數龐大的失業農民，而形成廣大的游民階級。也因爲如此，從明代中葉以來，一直到今天爲止，這地區便往往是中國內部問題最嚴重的所在。當我們回顧歷史，無論我們對這一地區的作亂反叛如何稱呼，都無法不承認這一農村破壞的事實。這個地區不僅是李自成、白蓮教、捻匪等接續出現的所在，也是後來北洋軍閥、八路軍主要的根據地盤。也正因爲，這一地區自明代中葉以來便漸漸成爲中國最落後的部份，也是中國經濟上的最大負擔。

(二) 而相對於這一地區的南方，特別是兩湖、兩江、兩廣，則由於六朝以來的不斷開發、不斷移民，而漸漸成爲中國經濟主要力量之所在。特別到了明代以後，也特別是兩湖、兩江，便成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

也由於如此，這一地區便產生了中國早期的資本主義形態。而受到這一情況的影響，這一地區，特別在兩江地帶，便漸漸成爲中國新思潮最活躍的地方。東林黨產生在這個地帶，復社產生在這個地帶，就是各種文社、詩社、各種文學新流派的出現，也多與這一地理、社會因素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相對的，北方則成爲保守、封建力量的根據地。

這兩個地區，自明代中葉以來，便是中國內部矛盾最大的兩個地帶，而中國如不能解決農村問題，特別是北方農村問題，廣大赤貧的農村和愈來愈多（像滾雪球）的游民階級便成爲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破壞力量。而封建官僚之到了這一地步，便與游民階級結合，以殘酷的特務結構來腐蝕國家的統治系統，於是，劉瑾、魏忠賢主義由是便成爲近代中國政治的道路。而社會上的幫會力量也就成爲一種控制人與運作的實際力量。美國學者阿倫特女士在她的《極權主義之起源》一書中曾說過：知識分子與流氓合作，是極權主義、非理性主義膨脹之一大因素，而中國自明清以來，早已就有了這種現象。因爲，靠著暴力與欺騙之交互作用，中國社會便快速地增強了對一個社會摧毀的力量。

四、近代市民社會的惡質化

關於中國近代史在時間上的劃分，一般人都以公元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爲分界線，但亦有人提出異議，如蕭一山、胡秋原等人主張將時間提前到十五、六世紀，其理由便在於那時的中國已在醞釀著巨變，主要的便是市民社會的興起和發達，用經濟學的術語說，這時的中國社會已經產生了早期的資本主義成份，於是便由此而帶動了中國各方面的變化。不管中國近代史如何劃分，但明代中葉以來，中國有一變動，到了鴉片戰爭前後，外來的因素又加速了此一變化，卻是不爭的事實。這種市民社會如果能夠正常發展，也許會給中國帶來另一個局面，因爲直至第十七世紀爲止，中國的國力和科技水準都還和西方不相上下，無如當時腐化已極的官僚機構，和社會不平衡的發展，不但使原有的社會不能向前邁進，反而連舊有的社會結構也產生衰敗、瓦解的現象，以至於在十七世紀以後漸漸落在西方之後而終於淪爲他國侵略的對象。

爲什麼會如此呢？首先是貨幣經濟對農村有著傷害。原來，「從理論上說，鄉村和都市是相關的一體。鄉村是農產品的生產基地，它所生產的並不能全部自銷，……因之，都市成了糧食的大市場。另一方面，都市裏的工業製造品除了供給市民外，很大的一部份是輸入鄉村的。鄉市之間的商業愈繁榮，雙方居民的生活程度也愈高。……但是，從過去歷史看，中國都市的發達似乎並沒有促進鄉村的繁榮。相反的，都市興起和鄉村衰落像是一件事的兩面。」（引自費孝通《鄉土重建》）由於這一階段的中國都市並不是建立在工業之上，不能吸收農村的多餘人口，相反地，那裏多是士大夫和地主居住的安樂窩，「他們有資本可以開典當舖，可以在穀賤時收穀，穀貴時賣穀，可以放高利貸，可以等鄉間的自耕農來押田借穀，過一個時候賤價收買。」（同上）這不但不能對經濟產生調節互助的作用，反而加重了農村的負擔，結果甚至產生穀賤傷農的悲慘現象。此一現象，顧炎武的〈錢糧論〉就曾有所敘述，他說：

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鄂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銀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夫銀非從天降也，礦人則既停矣，海舶則盡撤矣，中國之銀在民間已日消月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跡，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誦，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

這樣，就使得眾多無以爲生的農民，一變而爲徘徊於城鄉之間的游民；而在江南，特別是一些都市之中，更有數目不少的流氓無產階級出現，明代萬曆、天啓以後，由於政治上爲魏忠賢一類人物把持，更加多了這類流氓的數目。爲什麼會出現這類人物呢？簡單說來，那實在是腐敗的官僚政治與畸型社會的產物，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即云：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爲強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

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

這種情形有的後來便發展為有名的「奴變」，這就一方面助長了下層社會的結社運動，一方面為南宋以來的市民講唱文學（尤其水滸和三國故事）提供了一個發展的溫床。譬如定本於嘉靖至萬曆間的《水滸傳》，就充滿了游民階層所產生的背景，和種種游民型的人物與活動。為了方便，茲列舉如後：

（一）《水滸傳》的背景大多是凋敝的莊園。在水滸傳裏曾出現過許「太公」，如史太公、宋太公、毛太公、祝太公等等。這些太公實際上就是莊園的主人。我們綜合一下這些莊園的結構，不管大或小，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環境，莊園中有莊丁，也有油坊、酒店等小商店；莊園之外住的則是一些佃農、獵戶。在中國歷史上這些莊園本可過著很理想的天高皇帝遠的生活，但是天災、人禍，以及城市的興市，便使得些莊園不能不遭到衰敗的命運。中國早期的都市既無發達的工業可以吸收農村中過剩的人口，於是無以為生的人口便只有三條路可走：1.為兵，2.為盜，3.流浪於城市與城市之間。所以，在《水滸傳》裏，莊園的附經常是強盜佔領的山寨，而在都市裏便出現著李逵、武松一類游民和其他街頭耍拳賣藝的人物；同時也有鎮關西、牛二等活動於市井間的流氓無賴欺壓老弱婦孺。

（二）在中國舊社會裏，農民們是很少出外旅行的，於是出沒城市與城市間的旅行者，大多為官吏、商人、僧侶、道士、妓女，被押解的囚犯。而由於城鄉生活之差距，以及城市在經濟上對鄉村所形成的壓力，於是便造成鄉村人對城市人的憎恨。所以在《水滸傳》裏，一些開黑店的游民便有個不成文的規矩，除了僧侶、道士、妓女、犯人之外，其他的人，特別是錢財帶得多，大多都成了人肉包子的材料。

（三）由於幅員的廣大，和司法制度的不充分，在中國舊社會裏游民與游民之間便往往以個人與個人的結合作為保障生存之道，這不僅是《三國演義》中劉關張結義成為美談的原因，也是下層社會充滿結社的根本所在。久之，在各水陸要道，結社便成為維繫秩序的一種力量，甚至於衙門中的小吏們，也不得不與之互通聲息。在《水滸傳》中，宋江、晁蓋、雷橫等人，便是最好的代表，特別是宋江，他具有莊園太公之子的身分，又

在城市官場中為生，他深知自己的行為遲早會出問題，所以事先就辦好了與父親斷絕關係的文件，而由他流浪於江湖上的行為看來，他是早就與各地水陸要道的下層社會有著聯繫了。

（四）在這些游民行為中，固然有其豪俠的一面，但也有殘暴的一面，如《水滸傳》「供人頭武二郎設祭」時，曾如此敘述：

……叫士兵取碗酒，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也跪在靈前。武松道：「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仇雪恨！」叫士兵把紙錢點著，那婦人見勢頭不好，卻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腳踏住她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刻，口裏銜著刀，雙手去挖開胸脯，掘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脍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

又在「病關索大鬧翠屏山」一段中這樣描述著：

……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逕把迎兒的首飾也去了，遞過刀來……迎兒見勢頭不好，卻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石秀道：「嫂嫂，哥哥自來服侍你！」楊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不得……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又將這婦人七件事分開了……。

這些，等到他們進入都市後便一變而為另一種面貌，《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就是最好的代表。他由破落戶變成了暴發戶，由暴發戶變成了西門大官人，他一面交結地方官吏，榨取民間的血汗，一面奴顏婢膝地結納京官，步步爬升，果然由理刑副千戶做到正千戶提刑官。在這過程中，不知隱藏著多少人的生命、財產、眼淚與貞操。他乘著自己的財勢，專幹那些拐騙姦淫的勾當，搶奪寡婦的財產、誘騙朋友的妻子、霸佔民間的少女、謀害人家的丈夫。總而言之，社會最黑暗、最可怕的犯罪行為，他都做到，因為他與上下官府交結得好，無論做了什麼壞事，反而升官發財，行所無事。他既是有錢有勢，自然有一些朋友、一些爪牙替他幫閑跑腿。也有九

個好朋友：「頭一個喚應伯爵，是個潑落戶出身，一份兒家財，都敗沒了，專一跟富家子弟幫敗貼食，在院中頑耍，諱名叫應花子。第二個姓謝名希大乃清河衛千戶官兒，自幼沒了父母，游手好閒，善能踢的好氣毬，又且賭博，把前程丟了，如今做幫閑的。第三名喚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第四名孫天化，綽號孫寡嘴，年紀五十餘歲，專在院中闖寡門，與小娘傳書寄柬，勾引子弟，討風流錢過日子。……連西門慶共十個，眾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他做了大哥，每日輪流會茶擺酒。」

五、鴉片戰爭加速中國城市的幫會化

而且，我們還要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現實的發展，已無法支持中國的傳統，這就構成了知識分子的質變。原來，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傳統，那就是「耕讀傳家」，也因為如此，他們才能保持人性的尊嚴，不必使自己依賴別人（特別是官場）生活。但經過明代中葉至鴉片戰爭之大破壞以後，農村知識分子不是淪為《儒林外史》中的周進、范進，就是流浪為馬二先生那一類的市井人物，既不會耕，亦無餘力專致於讀，「衣食之不暇，奚暇致禮義焉！」於是，這些「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知識分子，說起來是四民之首，其實，與乞丐、娼妓相去不遠。這樣，類似汪容甫把文人與妓女同列、同悲、同憐的感嘆，也就隨之而生了。

而進入城市，進入官場的知識分子，也遭遇了另一種淪落，那就是先賣身投靠。等進入了那一士大夫的陣營，只要應付得體，便可以在眾多職位中轉來轉去，終老一生，此一情況，恰如麻將桌上的換位子一樣。這樣就必然造成了官場上的油條、世故。——於是在麻將法則成為官場上的永久不變的八陣圖以後，中國社會再經過什麼種族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仍然除不掉它的封建本質。非但除不掉，反而在官場的太上老君爐中鍛鍊以後，更增強了它的韌性，成為金剛不壞之身。梁漱溟說，教育愈集中於城市，知識分子也就愈加墮落，良有以也。這也是中國在近代社會愈來愈走不出改良主義道路的原因。

所以，宋元明以來，特別在鴉片戰爭以後，無以為生的知識分子便紛

紛作了明顯的轉變，他們不是成為官場、商場、軍閥的幫忙、幫閒、幫凶；便是與下層社會結合。在農村他們成為《水滸傳》中吳用那一類人物，在城市他們則成為《金瓶梅》中西門慶一類的角色。再上昇，也不過袁無涯、何心隱一夥而已。

在湘軍淮軍興起，曾、左提倡名教以後，這情況也未有多大改進。雖然，他們也為破碎了的中國帶來短時期的安全局面，並且也為某些地區（如兩湖、兩江）帶來新學運動，但他們並沒有推動中產階級的成長。沒有中產階級的基礎，中國的近代化與現代化是很難推動起來的。不僅如此，湘軍、淮軍還產生幾種負作用：他們延長了清朝的腐爛。雖然有人名之為「同光中興」（如陳寅恪有詩讚美曰：「廿載光陰憶光宣，猶是開元天寶年」……），其實那只是中國封建專制的迴光返照。由於與洋人合作、平定太平天國的經驗，便使得湘、淮的第二代漸漸變為洋務之執行人，並成為新的官僚體系——買辦階級。而正是這一批洋務大少，一批批在北洋政府、國民黨統治的統治下，為帝國主義鋪下了溶化中國民族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買辦階級的留學政策和 cultural 政策雖然在各地區建立了洋場，卻也一步步加深了西化的程度。這是新愚昧主義發展、興起的史實。而五四時代魯迅筆下的阿Q和假洋鬼子，以及錢鍾書《圍城》中的人物，正是這愚昧主義的一體兩面。

而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不能像歐洲近代那樣經由資產階級去完成革命，便只好依然延續「鄉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對新興的工商業城市實行打家劫舍的破壞。如此，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便只好一波又一波地走向倒退；倒退的結果，便是城鄉的互相傷害。

六、近代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尤其，到了晚清時代，中國的社會大致已到了下面的樣子：

（一）廣大北方農村所產生出來的游民階級，由長期的民怨而日益演變成暴民階級，這是中國近代恐怖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根源。

（二）原已腐爛的封建官僚統治系統，借助游民階級發展出來的「吏」來統治社會，使得這極權主義變成世界上最沒有原則的體制。

(三) 這樣以來，整個行政，特別是司法系統，便控制在流氓胥吏和幫會之手（借用張君勱先生語），而所謂的革命也無不與幫會、流氓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

(四) 正由於這種暴民階級發展成爲社會的主控力量，於是追根究底，在平日他們實在是培育社會紊亂和不安的最大溫床，更是引導整個社會走向腐爛的主要力量。即使在所謂的「革命」階段，也是只有破壞作用。於是，這革命很明白的只是一種引導社會倒退的力量，而不是像西方社會那樣因社會要往上發展而產生革命，相反的，它是沒有主動的社會發展而被生活無告的人群逼出來的革命。這就是得中國的資本主義無法成長。於是，在暴民階級一波又一波的摧殘下，中國的地主階級已經無法產生積極的作用，資本主義也無法成長。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無法真正建立起來，即使有之，也多是與游民階級結合，與幫會力量結合，與外國資產階級互相利用而生長出來的流氓資產階級與流氓無產階級。這樣，便又引導中國社會走向了不測之淵。

(五) 由於知識分子與流氓的結合，便使得知識分子漸漸成爲社會腐爛力量的幫凶，使整個社會愈來愈失去指導未來發展的力量。

(六) 城市是資本主義成長的地方，但中國的城市與歐洲型的城市完全不同，從古到今，它不但從來沒有脫離封建制度的控制，而且如前所引，中國的城市始終是封建統治體系中的一個基本環節，而且是實施封建統治的（在中央指揮下）各種發號施令的神經中樞的駐在地。於是，在官（其實多是胥吏、太監一流人物）商勾結之下，中國商業界便很難培育出獨立的中產階級。相反地，在幾千年抑商政策之下，中國能夠生長出來的也頂多是Frank所說的「附庸資產階級」。這一層人物以賄賂、逢迎作爲他們賺取利益的手段。這樣以來，它不但對中國官場造成極大的腐敗作用，就連一般民間也在它的影響下產生極壞的作用。這些都使中國社會被折磨得毫無生氣。所以大陸學者金觀濤說，這種社會所發展出來的城市不是健康的城市，而是患有肥大症的地方，由此這些地方從事的大多不是生產而是極端的消費和享樂，因此培育出來的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而是假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旨在累積資金，但這種假資本主義卻只能消耗原有的財富，而使之更加走向匱乏。

這些都是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社會的情況。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力量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在原始的農民暴動之外，太平天國又給中國人帶來另一種穿著洋裝而仍然是原始農民暴動式的革命。這些都給中國真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以深刻的撞擊。由於它們採取原始的農民暴動的方式，便一直繼承著打家劫舍，大碗吃酒、大塊吃肉、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農家素樸的浪漫作風，破壞有餘、建設無方。這一點，後來連慣於搞農民革命的毛澤東也深深反對（他說：紅軍中有爲數眾多的游民階級，如果不把此一游民階級解決掉，共產黨便無法不被人稱之爲共匪。）他認爲，這種原始農民式的暴動具有山頭主義的作風，而且只能享樂、不能建設，發展下去是道道地地的封建主義再版。這也就是《老殘遊記》中，對中國革命感到茫然的原因。因爲那個時候，中國革命的路子正依兩條道路進行著，一個是北方落後地區進行的義和團運動，一個是在南方資本主義正在成長地區所發展的太平天國運動。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北拳南革」。

由於中國在晚清時代所形成的南、北方的差距和矛盾，以及解決這矛盾不適宜再採用農民暴動的方式，於是在兩湖、兩江地區便出現了一種穩健的改良主義，那就是以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陳寶箴、沈葆楨等人（請注意不是康有爲、梁啟超，關於此，陳寅恪先生也特別加以暗示。）爲主的同光革新運動。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一看，近代中國如果還有保有一份積極的向上的力量，哪一些不是以這一「兩江、兩湖」爲基礎打定的現代化建設發展出來的？甚至連台灣的建設也不能不說是這一範圍的擴大。這一運動大概有幾點遠見：

(一) 發展民族工業，由於而產生漢冶萍公司、招商局、江南製造局、同文館等現代化建設，由是而奠定中國現代經濟的基礎。

(二) 以各種方法減低中國之內的矛盾，所以這一群人既反對洪、楊路線，也反對所謂的農民革命的反外路線，以免農村社會澈底破壞，減低生產。

(三) 也因爲怕中國社會原有的凝固力量遭到瓦解，而使中國在精神瓦解後走上虛無主義的道路，所以他們大多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論者，嚴復的態度（見他的年譜所載與孫中山先生的對談）可以作爲代表。

雖然這一發展爲後來的辛亥革命培育了革命的基礎，但是由於長江

中、下游地區也是帝國主義經濟力量進攻的主要地區，於是，在這一壓力之下，這一地區所培育出來的民族工業便漸漸為買辦資產階級所取代，這也是民國以後國民革命無法澈底貫徹的原因所在。再加上這一地區無法真正切斷與北京封建勢力的邊帶關係，因此，這一地區便無法像預期的那樣，產生現代建設的積極作用。甚至，在暴民主義連串作用和帝國主義不斷腐蝕之下，這一地區的農村也又幾次地遭到破壞，這些都使兩湖、兩江所培育出來的民族新興力量遭到根本的破壞，而不能對北方的封建根據所在中心，產生牽制或消融的作用。

這樣發展的結果，北方廣大游民階級活動地區，就由原始的宗教意識（如白蓮教、梁山思想）漸漸轉變成暴力主義和恐怖主義。而北方都市則處於思想落後的包圍之中，表面上有時呈現著一片新思潮（如北京大學），實際上卻充滿虛無主義的作風（如胡適之的五鬼鬧中華思想和企圖與北洋軍閥合作的好人政府路線）。而一些邊疆地區（如廣東、新疆等地）則因為與外來列強的接觸過於直接而有全盤西化、俄化，或者分裂意識的出現；而在這動盪不安中，各地原有的地方主義、家族主義（如山西閻家、青海馬家、雲南龍家、以及廣西桂系等等）便更加助長了中國的紊亂。這些都加大了中國從上到下的虛無主義的擴張與氾濫。這也是晚清文學所呈現的面貌。此一精神一直到五四以後，在魯迅、在郁達夫、在茅盾、老舍的作品中還一直出現，甚至於在張愛玲或鴛鴦蝴蝶派作家身上，更是形成另一種相貌而出現在人們眼前。

七、病態的中國現代化都市

這樣，原本對中國社會產生腐蝕作用的城市，一到了近代，便更加引導中國走向敗壞。上海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蔣夢麟在他的自傳《西潮》中的敘述，真可謂字字真言，茲全引如下以說明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推行現代化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蔣先生說：

上海是長江流域的金融中心。上海的繁榮應讓歸功是外國人的工商活動，外國資本是上海經濟結構的基礎，外國商人和資本家因

而成為上海的貴族階級，住在上海的人都向這些洋人低頭。這些洋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圈子，許多外國人雖然在上海住了幾十年，中國對他們卻仍然是個「謎樣的地方」。他們住在富麗幽邃的花園洋房裡，有恭順的中國僕人侍候著，生活得有如王公貴族，主人們靠剝削致富，僕人則靠揩油分肥。他們的俱樂部拒絕華人參加，似乎沒有一個華人值得結識；他們的圖書館裡也沒有一本值得一讀的書。他們自大、無知、頑固，而且充滿種族歧見，就是對於他們自己國內的科學發明和藝術創造也不聞不問，對於正在中國或他們本國發展的新思想和新潮流更無所知。他們唯一的目標就是賺錢。

地位僅僅次於這些洋人的中國買辦，他們像洋主人一樣無知，也像洋主子一樣富足。中國商人非常尊敬外國銀行和洋行裡的買辦。買辦們張大嘴巴向洋主子討肉骨頭時，他們的同胞也就流著口水，不勝羨慕地大搖其尾巴。買辦階級很像鍊金術士，可以點銅成銀。他們的洋主子則點銀成金。買辦們花了一部分銀子去討小老婆，他們的洋主子卻高明多了，只要在「女朋友」身上花點金子。

上海的第三等人物是商人。他們從買辦手中購買洋貨，賺了錢以後就匯錢回家買田置產。他們偶然回鄉探親時，自然而然觸動了鄉下人的「靈機」，因此到上海做生意的人也愈來愈多。

我所談的上海種種情形，多半是身經目睹的，絕無誇張之詞，因為我的許多親戚就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其中有些還是買辦。我對他們的生活思想知道得很清楚；同時，我認得不少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也聽過不少關於他們的故事。開明的外國人，尤其是我所熟悉的美國人，每當我們談起上海時，總是緊蹙雙眉，搖頭嘆息。

第四等人是工廠工人。他們是農村的過剩人口，因為在農村無法過活，結果放棄耕作而到上海來賺錢。他們是貧民窟的居民。

第五等人，也就是最低賤的一等人，是拉人力車的苦力。他們多半來自江北的貧苦縣分。這些名為萬物之靈的動物，拖著人力車，像牛馬一樣滿街奔跑。這種又便宜又方便的交通工具使上海的活動川流不息，使上海商業動脈中的血液保持循環的，就是人力車苦力。

這五等人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一般人所說的「租界心理」，一種崇拜權勢，講究表面的心理。權勢包括財力、武力、治外法權等等，表面功夫則表現於繪畫、書法、歌唱、音樂，以及生活各方面的膚淺庸俗。我們通稱這種「租界心理」為「海派」；與「海派」相對的作風則叫做「京派」，也就是北京派。「京派」崇尚意義深刻的藝術，力求完美。上海是金融的海岸，但是在知識上卻是一片沙漠。

上海人一天到晚都像螞蟻覓食一樣忙忙碌碌。他們聚斂愈多，也就愈受人敬重。在上海，無論中國文化或西洋文明都糟糕透頂。中國人誤解西方文明，西洋人也誤解中國文化；中國人仇恨外國人，外國人也瞧中國人不起；誰都不能說沒有理由。但是他們有一個共通之點——同樣地沒有文化；也有一個共同的誤解——斂財。這兩種因素終使上海的中國人和外國人成為金錢上的難兄難弟。「你括我的銀，我揩你的油」。

這就是處於殖民地的中國推行西化或現代化的社會基礎。如果說上海是中國現代化的搖籃，則在這一基礎上便由上面的第二等到第三人發展成為江浙財團，並由這財團產生了各種資產階級的具有濃厚買辦本質的資產階級政黨；而其中的第四與第五等人便打著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旗幟而成為所謂的無產階級政黨，這到了後來，就成為文革時的四人幫；而另一支就渡海到了台灣，形成了六〇年代以後的買辦資本主義。在這種白色的虛無主義與紅色的虛無主義相互鬥爭下，所謂的知識份子，雖自名曰自由主義者，其實不過是一群徘徊於二者之間的浪子而已。

八、西化派對中國社會之誤解

但是，有些人不作歷史的分析，卻一口咬定，中國專制主義之根源就是中國文化，就是中國的知識份子。而企圖再將之打壓（由俄式的矮化走向美式的矮化），這是很危險的。如若不信，我們不妨引出大陸西化派學者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來作為證明，他說：

在中國古代社會裡，農民佔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是和土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小生產者。如果沒有其他社會成份，小農將組成「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一個個分散的宗法村社。農民是封建社會中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他們的勞動生產提供了封建大國最主要的物質基礎。但農民不能成為封建大國的主要組織力量。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商人的活動很重要，但受到種種限制。和西歐封建社會一樣，執行者地域間經濟交往功能的商人，他們的力量相對弱小，也不是封建大國的主要組織力量。

在封建社會統治階級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皇室、貴族和地主。如果他們之中不分化出一個特殊的階層的話，情況又會怎樣呢？只有農民、農奴、商人、地主、貴族、皇室所組成的社會一般是封建小國。秦漢帝國建立以前的中國封建社會就是這種分裂割劇的形態。但是，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封建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土地可以買賣了，政治結構中出現了郡縣行政管理制度，並逐步形成了「士」這樣一個特殊階層。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士」在春秋戰國就十分活躍，所謂「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就描述了士在政治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士是秦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官僚機構成員的最主要來源。中國封建大國的建立，是和存在著士這樣一個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特殊的社會成份有著密切關係的。

經濟的分散性而處於游動之中，實行全國性的廣泛交往。中國儒生的遊學、遊宦生涯，正是這些特點的反映。

這裡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了上述文字，就是要人明白金觀濤所要宣示的「中國封建社會停滯的特殊原因」，亦即中國專制主義所以一直從古至今延續下來的根本所在，那就是：

中國封建國家的特點——以強大的中央集權克服分散性。這種專制主義國家組織了巨大的官僚系統、依靠政權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閉關自守、把鹽鐵礦及手工業置於官辦的經濟政策，依靠政權力量獨尊儒術對思想文化嚴密控制。這些政策有效地延續著封建制度，遏止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發展。

就因為如此，所以他便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一) 中國的專制主義之所以一直延續下來，實在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之不發達。

(二) 中國資本主義之所以不發達，實在是由於自秦漢以來一直貫徹著重農輕商（即本抑末）的政策。

(三) 重農輕商的政策，使得分散的小農經濟社會一直維持著愚昧的精神狀況，易於統治。

(四) 而能夠替皇室、貴族行使聯繫作用，並對之施行愚民政策的人物就是儒生和儒家經典。

(五) 所以中國傳統社的知識份子和象形表意的方塊字就是中國社會停滯不前，一直擺脫不了落後、專制的最大基礎。

九、農村文化失調與中國之衰敗

其實這裡所說的，大多指的是城市知識份子，而不是「耕讀傳家」的農村知識份子。農村知識份子之可貴在於他知道人民生活之辛勞和德性，而城市中的知識份子一代一代傳遞下去，便慢慢地失掉了生命的根本，「農村，是中國人土生土長的地方。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民族，到了忘記他的土生土長，到了不能對他土生土長之地分給一滴感情，到了不能對他

的土生土長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則他將忘記一切，將是對一切無情，將從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這種個人、團體、民族的運命，大概也會所剩無幾了。」（引自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

正因為如此，便使得一些中國知識份子轉化為一形態的類群，關於此，徐復觀先生便作了這樣的分析：

中國由貴族沒落而開始形成的士大夫階層，亦即是此處之所謂知識份子，第一、在社會上無物質生活的根基；除政治外，亦無自由活動的天地。在戰國時代所出現的「遊士」、「養士」兩個名詞，正說明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特性。「遊」是證明它在社會上沒有根；「養」是證明它只有當食客才是生存之道。而遊的圈子也只限於政治，養的圈子也限於政治，於是中國知識份子，一開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蟲，便是統治集團的乞丐。所以歷史條件中的政治條件，對於中國知識份子性格的形成，有決定性的作用。

而在中國歷史中，與知識份子最有關係政治措施則為科舉制度，這一制度更把知識份子逼進了一條死巷。因為：

科舉在事勢上只能著眼於文字，文字與一個人的行義名節無關，這便使士大夫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脫節，使知識份子對文化無真正底責任感；使主要以成就人之道德的文化精神沈沒浮蕩而無所附麗。文字的好壞，要揣摩朝廷的好惡，與社會清議無關，這便使士大夫一面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可完全棄置其鄉里於不顧，完全與現實的社會脫節，更使其浮遊無根。……科舉考試，都是「投牒自進」，破壞士大夫的廉恥，使士大夫日趨於卑賤，日安於卑賤，把士人與政治的關係，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之門，把讀書的事情，簡化為一單純利祿的工具。……由此可知，科舉本身之成為學問的障礙，固不待入股形成。加以大量增加的科舉「豫備軍」，拼命向一條窄路中擠去，自媒自貨，本無廉恥可言；倖得倖進，奸偽自必隨之以起。於是主持衡鑒的，「不在於求才，專心於防弊」；所以朱子說：「今日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此一盜賊性格的集團在社會必奸盜社

會，在朝廷必奸盜朝廷。……滿族以異族憑凌中夏，威逼利誘並進；八股之外，更創造出讀上諭讀聖訓等的奴化方法，於是士大夫在「盜賊」的氣氛外，再加強「奴才」的氣氛。（同上）

十、幾點感想

因此，我們不妨在這裡作出如是的了解：

（一）中國原本是一個小農社會。它的異化產生了無業遊民。這些無業遊民脫離了土地，脫離了生產，形成無根的一群。他們爲了生存便只好遊蕩於城鄉之間。而又由中國的城市缺乏生產的機構，於是他們或靠個人原始之條件換取生活所需，成爲權勢者的附庸或幫凶；或者爲了需要，相互結成幫派，操縱社會上的種種活動。這樣就更加造成城市的虛無化，而對於鄉村形成傷害。有的爲兵爲盜，直接破壞農村；有的以劫持所得，再變而爲地主（如章回小說之單雄信、鄧九公之流）。這是農村惡霸地主之來源。

（二）這一傳統對廣大農村有著莫大影響，此小說戲劇中薛平貴由乞丐而當兵而將軍而最後當了皇帝。這是農民的哲學，與科舉中的考狀元、招駙馬，同爲腐蝕中國國民淳樸心靈的兩條毒蛇。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反智主義、反理性道路。而中國的貧窮便相對地擴大了這一流氓、軍閥、土匪等等之結合而成的游民階級組合而成的社會。在這社會中，有的當皇帝，有的當朝臣，有的當胥吏，有的當謀士，他們既相互利用，也互相鬥爭。然不管如何，對一般人民而言，他們永遠是一座壓在身上的大山。

（三）而它的另一面便發展成爲奴才主義、市儈主義、強樑主義、恐怖主義、幫派主義。它應付人的辦法是鬥爭、是暗算、是陰謀，是盡量將人矮化。《水滸傳》中的吳用、《酷吏傳》中的來俊臣、宮廷派中的劉瑾、魏忠賢，都是最爲人熟知的代表人物。到了近代，穿上了洋裝，就成了十里洋場的二毛子。這類人物一到了政治場所，執掌了政權，便成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專制主義。在這類人物中，其觀念不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是也！」就是「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打此過，留下買

路財。」既然如此，他們的思想便只有下面的樣式：不是一旦成功，便嚴行流氓皇帝之訓令，否則，平日就盡其所能發揮其強樑霸道加無賴痞子的、不知廉恥爲何物的市儈哲學。這種作爲看以威風，其實毫無尊嚴。

（四）雖然是毫無尊嚴，但富貴權勢仍然是莫大的誘惑，於是脫離生產線的知識份子，一進入這一游民世界，便只有自我矮化，以適應統治階層所頒行的秩序，而到了近代，這種自我矮化有人美稱曰自我改造，實即與古代的學習「自我污辱自己」無異。

（五）及至西方強權到來，這種情況雖然變了樣子，而實質並未改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爲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際關係是由「親緣關係」(Familial relationship)走向「契約關係」(contractual relationship)。但是近代之中國，由於市民社會發展先天不足，後天貧弱，於是所謂契約關係便只能由追求勢利一變而爲種種腐爛行爲。而一些政黨的幫會本質更使「親緣關係」變成「組織關係」，由是人的本質一變而爲政治的奴隸。而愈是如此，人們對「人」的觀念便會一天天降低到只是一個「物品」只是一個「號碼」，只是一個零件，只是一個組織中的小「點」而已。如是便必然形成人的自卑（雖然有時顯現出來是一副「自大」）。人一自卑，便不會產生對生命所具有的莊嚴感。如是便只有在不同形式的物慾中找尋刺激，而這樣擴大起來，就必然造成整個民族的失落。

（六）俄國的近代思想家貝查也夫(Berdyaeu)在批評俄國近代演變中的民粹主義時，曾指出他們的矛盾，那就是：「知識階級的民粹主義者，既與土地分離，又欲返回土地。」這樣就造成了他們的失敗。與此相近，嚴復時代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多來自農村社會，因此他們的性格很大成份具有小農性格，他們一方面追求開放，一方面卻又眷戀土地。而農村的貧苦又使之嚮往山林；於是知識份子一進入城市，成爲士大夫階級便是法家、縱橫家性格；居於鄉便是儒家性格；居於山林便是道家性格；居於江湖，便是游俠或流氓性格。而「小國寡民」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的生活方式，便成爲他們追求的理想世界。陶淵明的「桃花源」所以活在知識份子心中，即此故也；而諸葛亮的南陽，只不過是這一理想的戰時體制而已。此一性格發展下來，便產生梁漱溟的鄉村運動和毛澤東的公社運動。梁用是儒家道路，毛用的是法家道路。二者皆脫離了近代發展軌跡，而成爲烏

托邦的追尋。這就是一九四九以後中國悲劇日益擴大的根本原因。

(七) 因此，中國推行近代化和現代化，不是一件簡單的政治工作，要完成這件工作，必須先有具備充份的知識基礎和道德修養。這就必須要有堅實的文化力量。首先，這必須先有廣大知識界的自覺才行。

今天海峽兩岸都在努力推行現代化，而這現代化又是城市為重心，其模式仍然是美國式的物質文明，即：犧牲農村發展都市，發展物質建設輕視精神文明，在這種情況下，知識份子如不能自覺，當政者如果還不重視教育，而只把教育文化當成統治的工具，中國會不會逃過另一次虛無主義的浩劫，恐怕是誰都難以擔保。

我們不能不對之有所警惕。

附錄：與胡秋原先生談虛無主義書

秋公尊前：

久未拜候，主要原因在於身體健康欠佳，去歲情況特別惡劣，幾至於腦不能思、手不能寫、口不能言，一個知識份子到了此種地步，真像囚犯被判了重刑。今年初因偶然機會得識三軍總軍院陳祥霖醫師，斷定病因為長期身體缺氧所致，而缺氧之原因又由於小舌腫大，四月中開刀將小舌切除，氧氣立即恢復正常，而近兩三年來之臃腫無力亦隨之消除矣。

身體恢復正常以後，曾再次回大陸探親。能與親人一敘別情，固然是悲歡交集，然觀察彼岸社會則又讓人憂心重重。吾有一友近曾為文分析近數年兩次所得之大陸印象，前次為「官貪民懶」，此次則為「萬民爭利」。我所見者，亦與此相去不遠。吾友雖留下上述印象，然對於未來之中國則抱有樂觀之期許；他以為今天之中國已進入新的市民社會，由此而發展下去，整個社會會鬆動活躍開來。關於這一看法，我很難以贊同，尤其回到台灣以後，接觸到社會的紊亂和政治界的缺乏道德，特別是知識份子的自甘於墮落，真覺的大陸的台灣化，台灣的香港化，真是死路一條。這是一看今天的深圳、廈門所呈現的「繁榮」

就可了解的。目前，似乎全世界目光都注視著中國，給人以莫大的希望，但是看到全國上下交徵利的行動，又不免有著無限的耽心。中國開放了，全國上下都動了起來，一個充滿生氣的新的市民社會就要來臨。這些固然帶給人們欣喜。但是一個從鴉片戰爭以來的疑慮也同樣提昇上來。西方世界在資本主義成長之時，曾帶給歐美社會某種程度的上升運動，不僅文學、藝術各方面一波又一波地有著豐富的收穫，即一般市民也大多在氣質上有著昂揚的表現，何以在我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卻處處呈現著虛無、頹廢的現象？今天台灣的外匯存底不斷為世人注目，何以在我們的官僚體系運作下，社會是如此地一片敗壞？大陸上搞了四十多年的社會主義文明，何以在統治階層的影響下，特權和自私竟如此像潮水氾濫？他們口口聲聲反封建，呈現出來的竟然比古代任何時代更封建；他們口口聲聲反帝，呈現出來的竟然是一片崇洋媚外。因此，大陸上的一些知識份子在痛定之餘，一方面思考馬列主義何以當年吸引了如是多的人，而結果卻產生如是大的悲劇？另一方面則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今天大陸上爭論著一個議題：中國的現實是應該是姓「社」（社會主義）？還是應該姓「資」（資本主義）？我曾半開玩笑地說：「也不姓『社』，也不姓『資』，最重要的它應該姓『人』，——這就是我的一位死去的老友唐文標說過的一句話：『人壞了，任何主義都是行不通的！』」

因此，今天海峽兩岸最嚴重的問題固然是政治、經濟等問題，而最根本的卻還是人的問題。最近台灣這邊的財政部長王建瑄在辭職後說出了台灣繁榮現象後面的運作程序：一些人官商勾結，利用特權、炒地皮、炒股票；然後以其炒地皮、炒股票所暴發得來的金錢再炒選票；結果由炒作政治而贏取更大利益，這種情況，大陸還不會出現，然而官商之勾結，則已經超過了前些年的「官倒」。如果依此而進，則官民爭利、中央與地方搶錢的情況也必然隨之加重。這樣，不出多少年，美、日等國「拆散中國」（或說得漂亮點曰「和平演變」）的現實，不能說沒有出現的可能！

這使我記起您所說過的虛無主義(Nihilism)。我記得您是這樣說的：

虛無主義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對人類所有最高價值剝奪其價值，沒有目標，沒有人生「為什麼」之答案。由於道德與其生存意志背道而馳，轉為不承認世界上有什麼道德、真理、正義；這些東西都是為自私自利之別名。只要於我有利，那就是對的，就是好的。一切信念觀念都

是門面語，都是假的，只有成功才是真的。結果就是種種墮落、犯罪、奢侈、酗酒、放縱、誹謗、顛覆、破壞、毀滅……。這也就是今天一般使用的意義，就是否定道德和價值，說一切道德和價值都是自私自利的一種藉口，或一種裝飾。實際上只求自私自利之成功。於是到了必要與可能之時，殺人或毀滅這世界亦在所不惜了。

由於道德與生存不相容，就根本不相信價值、道德之存在，不承認善惡有什麼區別；好人、壞人也沒有什麼區別。於是乎玩世、憤世、嫉俗、或隨世浮沈，一直到極端的「現實主義」，一切一切為了目前的享受；於是只有勢利主義；哪個有勢就有道理，哪個有錢就有個道理。於是趨炎附勢，終於出現獨裁主義，以毀滅人道為當然了。

什麼叫虛無主義？虛無主義第一是「無事不可為」，殺人、放火、謀財、害命、扯謊，什麼都可以幹。第二，基本的主張是什麼？就是「打破一切的廉恥」，就是徹底無恥。

這樣一來，事實上虛無主義已經變成了痞子主義。有一位大陸青年問過我一個問題，這問題也同樣被我在台灣的朋友提出過：「是不是今天中國民族的氣數已盡？要不然為什麼那麼多的人窮也窮不起，富也富不起。一一窮了，就人窮志短，壞事幹盡；富了，就飽暖思淫慾，無惡不作。」更有位朋友說：「五四前夕，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曾在章士釗的《甲寅雜誌》上表示過：中國要想站起來，最好先讓人瓜分。今天中國人一離開本土大多表現得勤勞克己，彬彬有禮，一回到本土便故態復萌；是不是我們這個民族還要多受些折磨，才能得到教訓呢？」聽了這些憤慨以後，我表示了如下的意見：「如果像多少年前巴金所說的那樣：中國在面臨民族虛無主義的危機，那實在有點奉承。為什麼呢？因為如雅士培所言：虛無主義在某些時候還有著催化劑那樣的積極作用，然則目前海峽兩岸的虛無主義已經連這點起碼的作用也失去。五四以來，中國的官場、學府、文化界愈來愈增多了幫派作風、山頭主義、鄉愿習氣。這就使得我們的社會充滿了官僚、學閥、文棍一類人物。然而，在最初，官僚主義還有些為官之道，學閥還得多少唸些書，文棍也起碼具有文字的修養，但到了今天則漸漸連這些也很少具備，不學有術，無所不為；以至於以當漢奸為最大榮耀。

這不是虛無主義，是道道地地的痞子主義。」而痞子主義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阿Q。抗戰時代方東美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從阿Q正傳說到人生觀〉。他沈痛地指出「阿Q所代表者是人生是醜陋的一方面，世界最黑暗的一方面」，沒有理想、沒有道德、沒有價值、沒有尊嚴，既當婊子又要貞潔牌坊。這樣所形成的一個毫無莊嚴氣象的民族還能不受制於外族嗎？因此我們如果不去根除這些醜陋，而還唾面自「甘」，樂於以屈辱當榮耀，則中華民族的苦難還不過開始而已。

猶記前幾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前夕，某報曾舉報了一個座談會，推論會不會遭到鎮壓。大家由大陸談到台灣的發展。有幾位教授認為台灣最嚴重的問題依然是軍隊黨化等等。有位朋友一定要我講幾句話，我說：軍隊黨化固然是個重要課題，但它已不像以往那樣嚴重，因為開發中國家為怕軍事政變，莫不經常調動軍官，變成兵不知將，將不知兵。但是在開發中國家中隨著經濟的成長，卻產生另外一種嚴重現象，那就是「流氓黨化」，那就是政黨透過流氓、幫會來達成統治；選舉用流氓、治安用流氓，最後黑白二道人物，搖身一變為黨國大老；知識份子也一天天流氓起來。執政黨既走流氓路線，在野黨也必依樣制人；鬥爭的結果，人性必然惡化。於是海峽那邊便演變成有形的文化大革命，海峽的這邊便繼續著無形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經過俄化、美化（亦即紅色與白色的外化）相互腐蝕的結果，我們便變成一個空有幾百億外匯存底，空有著軍事強權的低等民族。其中最可怕的，便是知識份子流氓所帶來的教育文化的失落，而幾家大報和電視台，更是有其不能推諉的罪過。

我這段談話，當然沒有刊登出來。我也不以為憾。但近十多年來，曾參與一些所謂的知識份子活動，愈來愈覺得絕望，於是近年來退出一切活動，閉門讀書，並閉門思過。近由貝查也夫的《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原》推想起中國的虛無主義，又再次重讀您的《西方文化危機與二十世紀思潮》和《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乃作了一些讀書札記，特奉上多請指教。

敬祝

大安

晚

尉天聰敬上